

# 环境社会学的“中国时代”

陈占江 赵象钢\*

**摘要：**中国环境社会学从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和对本土环境问题的研究起始，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学科意识逐渐凸显，至今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独特价值关怀与研究旨趣的中国社会学分支学科。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公众环境意识的日益觉醒以及学术共同体理论自觉的不断加强，将进一步锤炼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术品格和学科特色。中国环境社会学将迎来一个植根自身文明传统和社会实践且在世界学科领域具有更大影响的“时代”。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 “中国时代” 理论自觉 学科建设

环境社会学从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到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中国社会学分支学科，已有40年。<sup>①</sup>40年间，中国环境社会学逐渐完成从“学科无意识”到“学科自觉”、从“隐学”到“显学”的历史转变。

---

\* 陈占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等；赵象钢，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等。

① 本文将狄菊馨、沈健翻译的邓拉普、卡顿的《环境社会学及其基本的分析结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第11期）视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开端。

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环境社会学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学科地位上都具有突破性进展和关键性提升。然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国环境社会学应当如何迎接蕴含其间的挑战和机遇显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将重新回顾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重新审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现实处境以及重新把握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方向。

## 一 引介与探索：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初期，环境社会学以一种尚未明晰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社会学的场域中，开启了早期的“环境问题”研究。随着环境问题的演变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中国环境社会学逐渐摆脱“学科无意识”的状态，转向自觉地学科构建。

### （一）基于现实关切的“环境问题”研究

作为一门研究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学科，环境社会学在诞生之初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环境社会学的诞生，都与本土的环境问题密切相关，中国亦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初，“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政策导向引发了严峻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随着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日益深化，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不仅是技术性问题，而且同特定的社会结构和过程有关，与人们的行为过程有关。<sup>①</sup>因此，单单运用自然科学来解释环境问题已然不够，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交织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介入，从多学科的角度立体地看待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环境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

<sup>①</sup> 洪大用：《试论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学的阐释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发展之初引介了许多国外环境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sup>①</sup>也有学者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产生背景、发展阶段以及主流理论范式。<sup>②</sup>国外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但此时的中国学者并未使用这些理论范式对中国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而是基于对中国本土环境问题的现实关切和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感知,意识到社会学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做出了许多积极而有益的初步探索。在此意义上,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发展之初就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自主性和本土性,这也为中国环境社会学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对国外理论进行反思与对话创造了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费孝通是将环境问题带入中国社会学的第一人。1978年12月,重访广西大瑶山的费孝通发现,“大跃进”时期“以粮为纲”的政策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在他看来,农业和林业是两种不同的生态系统,二者不能相互取代。<sup>③</sup>在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费孝通呼吁政界和学界应及早重视、积极防范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城市向小城镇和农村的污染转移。<sup>④</sup>对于边区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费孝通主张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文化延续之间应保持动态平衡而非

---

① 参见邓拉普、卡顿《环境社会学及其基本的分析结构》,狄菊馨、沈健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第11期;鸟越皓之《日常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徐自强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8年第3期;弗雷德里克·H.巴特利《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冯炳昆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弗洛伊登伯格《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刘霓译,《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8期;格拉姆林、弗洛伊登伯格《环境社会学:关于21世纪的范型》,刘霓译,《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② 洪大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③ 《费孝通全集》(第8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④ 费孝通:《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水土保持通报》1984年第2期。

畸轻畸重。<sup>①</sup> 对于内地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费孝通认为其根源在于西方知识体系的侵入破坏了传统中国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循环。<sup>②</sup> 受费孝通的影响，麻国庆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应着眼于不同族群及其生活方式所蕴藏的地方性知识。以游牧民、山地民和农耕民为代表的三种族群生计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所差异，由此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对环境保护有深刻影响。<sup>③</sup>

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卢淑华的城市污染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意义。她于1994年首次运用调查问卷对东北某工业城市的居民进行调查，收集和分析该市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认知状况并与其他城市居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当地居民的住房区位分布与个体权力背景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某些污染严重的街区，工人居住的比例高于全市工人居住的平均比例，而干部居住的比例则远远低于全市干部居住的平均比例。<sup>④</sup> 此外，20世纪90年代对城市居民、大学生或全国居民所做的环境意识调查折射出我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这些调查对于后来的相关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整体而言，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而环境社会学则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环境问题的外显性和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性使得上述研究中包含着浓厚的现实关怀，学者们在忧心忡忡中寻找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描绘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并试图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此时进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而应称之为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的“环境问题”研究。尽管这些探索性研究在理论建构和解释力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方法的应用还不成熟，但在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探索时期，

① 费孝通：《边区开发〈定西篇〉》，《开发研究》1985年第1期；费孝通：《边区开发〈包头篇〉》，《管理世界》1986年第2期。

② 张冠生：《青山踏遍·费孝通》，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271~273页。

③ 麻国庆：《环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观》，《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④ 卢淑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本溪市的环境污染与居民的区位分布》，《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正是这些尚不成熟的“环境问题”研究为后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富有启发的学术起点,一个环境社会学的“中国时代”也由此发轫。

## (二) 基于学科意识的“环境问题”研究

在 21 世纪之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处在一个学科意识尚显薄弱的自发阶段。在此阶段,虽然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对环境问题展开研究,但中国环境社会学仍处在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直到进入 21 世纪以后,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中国环境社会学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学科定位、学术成果、组织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sup>①</sup> 与之相应的社会现实是中国经济建设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尽管此时人们的环境意识已经有所觉醒,环境保护也得到政府的重视,但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并未因此减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环境抗争等事件时有发生,环境问题涉及的社会主体与产生机制也更为复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国环境社会学意识到需要承担起自身的时代责任,在环境问题多发、环境形态复杂、环境变化多样的中国田野树立明确的学科意识。21 世纪至今的中国环境社会学针对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产生了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开始迈向理论自觉的“环境社会学”研究。

首先,学科意识愈发凸显。在对国外环境社会学理论进行吸纳与反思的基础上,运用国外环境社会学理论分析中国现状。比如,洪大用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从整体层面分析中国政府推进环境保护的实践与成效,

---

<sup>①</sup> 顾金土、邓玲、吴金芳、李琦、杨贺春:《中国环境社会学十年回眸》,《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并指出中国生态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sup>①</sup>同时,对环境社会学的经典基础理论、学科定位、学科合法性等进行了许多探讨,为环境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李友梅、王芳等通过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的经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分析了经典理论所蕴含的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指出其在环境社会学理论构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局限性。<sup>②</sup>吕涛指出尽管许多环境社会学家以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对环境变量属性的分歧会使得环境社会学与生态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间的界限难以界定。为此,他提出了环境社会学研究的ESSP (Environment-Socialization-Society-Paradigm) 范式和SAEP (Society-Action-Environment-Paradigm) 范式,对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做出了探讨。<sup>③</sup>陈占江则基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在重新检视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学科品格、研究伦理和方法论取向的基础上,对如何重构环境社会学的内外合法性基础进行了讨论。<sup>④</sup>

其次,本土特征日益鲜明。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许多具有本土特征的环境社会学理论。比如洪大用提出的“社会转型范式”、<sup>⑤</sup>荀丽丽和包智明对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双重角色”的探讨、<sup>⑥</sup>陈阿江关于“人水和谐”的理论探讨,<sup>⑦</sup>以及张玉林对“政

① 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② 李友梅、翁定军:《马克思关于“代谢断层”的理论——环境社会学的经典基础》,《思想战线》2001年第2期;王芳:《文化、自然界与 Modernity 批判——环境社会学理论的经典基础与当代视野》,《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③ 吕涛:《环境社会学研究综述——对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

④ 陈占江:《迈向行动的环境社会学——基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

⑤ 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环境问题——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

⑥ 荀丽丽、包智明:《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基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⑦ 陈阿江:《论人水和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陈阿江:《再论人水和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经一体化”的分析等。<sup>①</sup> 第二,形成了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具体来说,在经验研究方面,形成了水环境研究、草原环境研究和海洋环境研究三个较为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并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sup>②</sup> 在环境抗争、公众环境意识、环境群体性事件、环境政策、垃圾治理等研究议题上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关照也有从环境问题的成因、影响研究转向环境治理研究的趋势。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一定的本土特性。与西方环境社会学者偏重于使用定量研究对环境问题进行解释不同,我国环境社会学者更倾向于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群体的质性研究,同时进行了许多政策取向的研究。这与我国社会学发展至今的学术传统和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最后,研究视野更加宽阔。实现“理论自觉”的环境社会学研究,除了要建立有效的理论支撑、树立明确的理论立场、保持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自觉,还要自觉了解和学习中国的文化传统,最终将“理论自觉”内化为中国环境社会学者的集体意识。<sup>③</sup>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和现实实践的传承中,有深厚的生态传统和丰富的生态遗产值得挖掘。<sup>④</sup> 在这一方面,中国环境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学术再创。同时,也有学者意识到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环境社会学必须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张玉林就提出环境社会学要与环境史“接轨”,从而使环境社会学超越传统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sup>⑤</sup> 陈阿江则探讨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技术手段如何拓展环境社会学研究。<sup>⑥</sup> 洪大用等对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学

① 张玉林:《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5期。

② 陈涛、崔凤:《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与研究特色》,《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③ 洪大用:《理论自觉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④ 陈阿江:《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⑤ 张玉林:《环境社会学的特殊性与环境史》,《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⑥ 陈阿江:《技术手段如何拓展环境社会学研究》,《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

分析,<sup>①</sup>为我国环境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全球视野,指出了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新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环境社会学在21世纪以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对国外环境社会学理论进行吸纳与运用的过程中注重与中国经验相结合,并从不同视角和层次对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诸多探讨。在此过程中,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构建明显进步,学科地位明显提升。

## 二 内推与外压: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动力

历史表明,中国环境社会学对国外理论的引介与自我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步进行。这一发展路径既与中国本土社会现实的转变有关,同时也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中国环境社会学在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改变着自身在世界环境社会学中的地位,也在对西方理论“去中心化”的过程中改变着世界环境社会学的格局。

### (一)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内部推动

与西方不同,中国环境社会学面对的并不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转型,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巨变。对从环境变化的现实中寻求理论解释的环境社会学而言,中国这种巨变式的社会转型为中国环境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地域广阔、形态多样的经验观察空间。它既包括传统的乡土社会,也包括拔地而起的一座座现代城市,并延展向中国与世界的交互之中。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虽然也存在环境问题,但它属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国与世界的交互不像今天如此频繁,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动也不似今天如此迅速而剧烈。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学者

<sup>①</sup> 洪大用、罗桥:《迈向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与民众的多方合力,从内部促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的“中国时代”。

第一,自上而下的国家重视。1973年,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开创环境保护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环境保护在中国开始列入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会议召开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及其有关部门,都相继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并着手对一些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和江河进行初步治理,由此揭开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1979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明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中国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在40年的时间里逐步建立、修订、整合和完善。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化解这一矛盾,国家在发展理念、政策设计、体制创新等方面将“环境治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自上而下的国家重视不仅为中国环境社会学提供了必要的政策空间,亦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

第二,自下而上的社会觉醒。中国环境问题的演变在两个过程中展开:自上而下的国家重视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觉醒。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加速了社会觉醒的进程。互联网将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媒介相互连接在一起,各种环境信息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并发生影响。目之所及,电脑、手机甚至智能手表已经成为人们了解外界的主要工具和窗口,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介和信息传播平台使人们发布与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对环境问题的感知愈发清晰,各种环境知识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环境社会学的“中国时代”也是一个环境信息的冲击时代,世界各地的生态变化和环境问题为中国民众所感知,中国的环境问题和治理措施也为世界所关

注。当中国的专家学者为中国民众的碳排放指标据理力争时，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这种信息冲击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中国民众对环境问题的态度亦在这种冲击中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现实的环境问题可以借由虚拟网络放大，也可以借由虚拟网络进行遮蔽，但人们总会在其中寻找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信息并加以解读。中国民众的环境意识正是在这种放大与遮蔽中不断建立。自下而上的社会觉醒既改变着中国环境问题，也重塑着中国环境社会学。

## （二）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外部压力

如前所述，环境社会学“中国时代”的到来与两个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一是中国转型加速发展，各种环境问题不断浮现；二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的环境社会学者既要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种种环境问题，也要面对西方现代性兴起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各种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期所产生的各种环境问题同样在中国出现，中国的环境社会学者需要在一种现代性转变的社会情境中去看待中国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并以此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做出科学的解释与预测。中国与世界日益频繁的交流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常态，要从这种动态的情境中去理解中国的环境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必须要建立一个立足本土、连通国际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

历史地看，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环境社会学都是在试图回答“本土环境问题何以产生与如何解决”的基础上诞生和发展的。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由战争和市场扩张逐渐将各个相对孤立的国家连接起来并形成现代世界体系。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试图借助不平等的游戏规则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对中等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施加影响并由此固化这一结构。作为工业化的“副产品”，发达国家借助世界性的劳动分工体系和商品交换网络不断向中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转移污染。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过程就是污染转移的

过程。跨越空间边界的环境问题不断制造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不平等。面对环境问题的演变,美国、欧洲、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在视域扩展和学术竞争中不断提出新的概念、理论或范式,在世界学术市场占据着核心地位。

欧美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对中国环境社会学不免造成一种外部压力。这种压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环境社会学能否在世界学术的边陲地带真正坚持和彰显自己的主体性;二是中国环境社会学能否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实践经验提出富有解释力和竞争力的理论概念。事实上,这种压力不唯中国环境社会学所独有,整个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都面临如何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学术不应停留在对西方学术的照搬照抄或简单移植。环境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尽管不同国家的环境问题在发生机制上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生态理念、政策取向、实践应对等方面依然存在国家或区域差异。也正因为此,中国环境社会学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压力的客观存在,中国环境社会学一直在努力摆脱他国的影响,坚持本土化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综上所述,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过程,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谓的“内部推动”和“外部压力”,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对立。中国环境社会学既要应对环境问题所提出的结构性挑战也要面对国际学术界所产生的示范性压力。在社会与学术的张力中,中国环境社会学快步前行。

### 三 前景与路径: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趋向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和初步建构时期的中国环境社会学所面对的国内情境和世界格局已大有不同。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和世

界结构的深刻转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与调整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与理论构建，在中国与世界互相嵌入的动态情境中建设一门具有中国意识和中国风格的环境社会学。易言之，中国环境社会学必须在回应中国环境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全球环境治理的整体需求中加速自身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进而迎接环境社会学的“中国时代”。

### （一）在超越西方限制中实现理论自觉

作为舶来品，中国环境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带有的一种移植性格。借助西方的理论范式解释中国环境问题，既为中国环境社会学获得某种学科合法性提供支撑，亦在一定程度上为破解中国环境难题提供思路或启发。然而，任何社会理论都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传统和实践经验。超越时空的理论显然并不存在。通过结合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中国环境社会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脱胎于西方经验的理论范式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解释中国问题，以及这种“适用”是否隐含着对中国经验的扭曲，无疑需要前提性反思和批判。遗憾的是，尽管许多学者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经验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意识，但并未从中进一步发展出适合中国情境的学术话语和理论范式。

中国环境社会学欲彰显其主体性，必须在超越西方限制中实现理论自觉。所谓“理论自觉”，主要是指研究者对其运用的理论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sup>①</sup> 在西方社会学依然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背景下，中国环境社会学应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前提预设、经验基础及其依赖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加以认识，进而对其限度做出准确的判断。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排斥和拒绝。中国环境社会学显然要对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

---

<sup>①</sup> 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问题进行观察和分析,但中国环境问题的发生机制和解决方案无法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事实上,中国环境问题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复杂交织的产物,既具有“本土性”,又具有“全球性”。以此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主体性必然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有机对话中形成。唯有建立一条既能通过西方理论透视中国现实,也能通过中国理论透视全球环境变化的双向理论建构路径,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新时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真正的理论自觉。

## (二) 在坚持实践导向中彰显人民关怀

众所周知,“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重要传统。在以“经世致用”为取向的学术研究中,知识分子的生命意义与普罗大众的生活福祉实现了有机联结。无论是将西方社会学译介到中国的严复还是终身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费孝通均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取向。费孝通积极主张“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sup>①</sup>,将“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视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内容。<sup>②</sup>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学的实践品格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取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环境社会学已经完全将自己嵌入实践之中。当下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往往滞后于环境政策的制定,尚未起到引领政策制定和指导实践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与社会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

当前我国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层变革和绿色转型。在推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约束日趋加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交织更加复杂。<sup>③</sup>可以说,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进行着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① 费孝通:《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江苏社联通讯》1981年第17期。

② 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洪大用:《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就此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应进一步将学术研究扎根于鲜活的生活实践之中并由此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关怀。学术研究应“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而不是单纯作为一种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追求。从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根深蒂固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实证主义与理解主义等二元论思维模式在割裂社会整体属性的同时亦切割了学术与社会的有机联结。<sup>①</sup>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植根实践、迈向人民的学术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方环境社会学所陷入的危机。然而，西方中心主义的阴云并未完全散去，以西方理论衡量、评判、裁剪中国实践的思维依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坚持实践导向的前提下应进一步将学术研究与人民福祉联系起来。如此，中国环境社会学方能焕发勃勃生机。

### （三）在发掘文化传统中扩展学科界限

20世纪初，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H. 金怀着对美国农业前途的忧虑来到东亚地区考察，回国后写了《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业》一书盛赞东亚的传统农业。该书指出用养结合、精耕细作、间套复种的多熟种植制度是中国农业能够维持地力长新、持续发展的原因所在。<sup>②</sup>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共生共荣。然而，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否弃”。这种“否弃”不仅成为中国环境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环境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文化根源。对于中国环境社会学而言，无论是古代的思想资源还是现实的实践传承所蕴含的生态传统和生态遗产都应努力挖掘和开发。<sup>③</sup> 申言

① 陈占江：《迈向行动的环境社会学——基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

② 富兰克林·H. 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

③ 陈阿江：《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之,儒家思想中的生态观点、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以及数千年农耕实践所形成的生态知识均应成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知识构建的重要来源。

费孝通在晚年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对社会学进行了本体论反思。在他看来,传统社会学的本体论将自然视为社会的对立面,否定二者之间的包容和融通关系。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制造了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而且限制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解释边界。因此,社会学应回到“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传统中寻求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可能。<sup>①</sup>尤其在现代性跨越地域边界的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进一步导致自然与社会的界限更加模糊,自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更加隐蔽,自然与社会的互动结果更加复杂。中国环境社会学应找回“社会”的自然维度。通过“找回自然”,在自然与社会、理性与感性、身体与心灵、历史与现实、西方与东方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重新建立对话、联结或融合,重新理解被社会/自然二元论掩盖、遮蔽、遗忘、肢解或扭曲的研究对象,在重构环境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诊断方式中扩展环境社会学的传统界限。<sup>②</sup>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sup>③</sup>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国环境社会学既不能不加反思地移植和套用西方理论,也不能不加批判地照搬和复制中国传统。唯有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寻找经验与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结,方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环境社会学。事实

①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② 陈占江:《“找回自然”:社会学的本体论转向》,《鄱阳湖学刊》2021年第3期。

③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5月4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e\\_1122783997.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e_1122783997.htm)。

上，也只有如此，中国环境社会学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 四 结语

历经 40 年风雨兼程，中国环境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汪洋大海中不断探索与前行。曾经分散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者逐渐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关怀和研究旨趣的学术共同体。在此过程中，中国环境社会学逐渐从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与迷思转向自主的创造和平等的对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及其相应的治理实践必然进入全球学者的视野之中，世界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及其相应的治理实践也必然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之中。在中国与世界的学术互动中，独立且富有成效地构建一门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显然是来自时代的深沉呼唤。面对这一时代呼唤，每一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都应当重新阅读西方经典、重新返回中国传统，在深耕田野、迈向人民的学术实践中积极迎接环境社会学的“中国时代”。



on, as well as numbers of methods and analytical concepts.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bio-physical environment”, sometimes does not suffice because of the deepening interpenetration of them recently.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a draft of diagram that categoriz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ree major research field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1) the life and livelihood social systems; (2) the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nvironment; (3) the biologic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 addition to these three systems, the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social systems that have been derived from life/livelihood systems aft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giving impact on above three systems. Comparing the impact on the geophysical/geochemical systems and that on the bio/ecological systems, I will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Social Systems; the Life and Livelihood Social Systems; LGBT Model

## The “Chinese Era”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Chen Zhanjiang Zhao Xianggang / 18*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research on lo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hines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as emerged as a branch of Chinese sociology with unique values and research interests after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awakening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China’s academic community will further develop academic character and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Chines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will usher in a “Chinese era” which is rooted in its own civilization

tradi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and gains more academic influence at the global level.

**Keyword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Chinese Era”;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 **Classical Theory Review**

### Theoretical Bases and Concepts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Wang Jing / 34*

**Abstrac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ory explains environmental traged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American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It states that as the modern American society lacks the tradition of managing the commons, the commons will eventually turn into environmental tragedies when the property rights are unclea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s not coordinated. The theory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Malthusian theory of population, Darwin’s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Lloyd’s model of the commons. It reveals a historical issue of America. That is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s, with property rights of which are inseparable, can hardly be solved given the in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sources of unregulated commons, the western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 the context of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 To conclude, Hardin’s theory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makes an initial effort to examine the problems of the commons in a systematic way and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further studies in many fields. However, his theory is also debatable as it takes the system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of capitalism.

**Keywords:**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Problem of Population Growth